

【研究論著】 General Article

DOI: 10.6163/TJEAS.201912_16(2).0001

中古時期之粟特胡及其影響唐蕃關係之研究

The Sogdians in the Middle Ages and their Impact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Tang Dynasty and Tibet

林冠群

Kuan-chun LIN*

關鍵詞：中古時期、粟特胡、唐蕃關係、恩蘭達札路恭、東突厥—回紇與粟特胡

Keywords: The Middle Ages, Sogdian, Sino-Tibetan Relations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Ngan lam stag sgra klu khong, Gök Türk-Uighur and Sogdia

2018年9月12日收稿，2019年1月14日修訂完成，2019年4月23日通過刊登。

*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講座教授

Chair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摘要

粟特胡於西元七、八世紀活躍於亞洲東半部的農牧地區，掌控了東西貿易，同時為便於經商獲利，介入亞洲東半部的農牧政權內部，以其長年來往於東西各地，具備廣博的知識，以及對各地政治的敏感度，試圖發揮其影響力，以獲取掌控東西貿易之利。其先後於突厥、回紇等北亞游牧政權擔任政治顧問，亦曾作為政治使節或軍事將領來往於東西南北各國之間；俟突厥勢弱，彼等亦大量徙居於唐朝，爾後造成安史之亂，唐朝國力為之中衰；回紇乘此時機崛起，亦得到粟特胡的襄助，於唐回之間興起絹馬交易，從中獲利，並改變了唐回關係的內涵。凡此，說明了粟特胡的活動，影響了中古時期農牧政權間關係的演進。

吐蕃於李唐安史亂作之時，侵佔李唐河西、隴右之地，佔領絲路東段，改變了當時唐蕃間的形勢，吐蕃一躍成為主宰亞洲東半部農牧地區的力量。本文主旨在於探求粟特胡究竟在唐蕃互動關係之中，是否扮演著有如促進李唐與突厥、李唐與回紇之間關係演化的角色？粟特胡是否一如進入突、回汗廷般，也進入吐蕃王廷，活躍於吐蕃的政治與文化舞台？因為既然粟特胡足跡遍及歐亞內陸，為何獨漏與李唐、大食、突回等同屬歐亞內陸強權的大國——吐蕃？

Abstract

The Sogdians circa 7-8th century was active in the arable and grazing regions of the eastern part of Asia and took control of the east-west trade. They, meanwhile, intervened in the nomadic regimes of the eastern part of Asia in order to obtain advantages in business. Sogdia's long term contact with the east and the west helped them gain broad knowledge and possess sensitivity to politics in each area. It resulted in Sogdia's attempt to spread its influence so as to earn profits via the east-west trade.

The Sogdians successively served as political consultants to the nomadic regimes in northern Asia such as Gök Türk and Uighur. They have also dispatched political envoys or high-ranking military officers to cope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When Gök Türk became weak, the Sogdians took the chance to migrate to the Tang Dynasty's domain. The mass migration eventually triggered the Rebellion of An Shi which brought about the decline of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rise of Uighur. The Sogdians in the meantime promoted silk-horse trade between Tang and Uighur and earned profits from it. The trade simultaneously changed the connotation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Tang and Uighur. This is an example that demonstrates how Sogdia's activities influenced on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nomadic regimes in the Middle Ages.

Tibet during the An Shi Rebellion occupied Tang's He-xi and Long-yo areas and controlled the Silk Road's eastern section. Such invasion changed the situation between Tang and Tibet and led Tibet to become the dominator in the nomadic regions of the eastern part of Asia. This article mainly investigates if the Sogdians did play a decisive role 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ang and Tibet as it did in fostering Tang-Gök Türk and Tang-Uighur relations. Did the Sogdians enter Tibet's imperial court and participate in political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of Tibet as it did in Gök Türk and Uighur? Since the Sogdians has left footprints all over Eurasia's inland, is it fair to say that they did not appear in Tibet, a great power in inland Eurasia as the Tang Dynasty, Tazi, Gök Türk, and Uighur etc.?

壹、前言

近讀日本間野英二（1939-）於一九七八年所發表名為〈中央亞細亞史與絲路——絲路史觀的訣別〉一文，¹其中對於唐代時期居住於中亞河中地區的粟特人，是當時最活躍的東西貿易商人之學界共識，有如下的質疑：

粟特人所留下的以自己語言書寫的文獻太過缺乏，因此，這些粟特商人在故鄉粟特地方，究竟其社會地位如何？他們的活動究竟在粟特地方的經濟之中佔有多少份量？關於這些事我們到現在還弄不清楚。²

尤有進者，間野質疑粟特河中地區的富有，並非經商所致，其舉河中地區的阿胡拉西雅布（Afrasiyab, 古代撒瑪爾罕的遺址）及彭吉肯特（Penjikent, 位於今塔吉克西部澤拉夫尚河畔），所出土的建築物壁畫為證（見圖一），認為當時河中地區的富有，主要來源於以農業為中心的產業，壁畫所展現者為貴族的、騎士的社會，而非大商人活躍的商人社會。³

然而，眾所皆知，所謂以農業致富的論調，事實上是無法成立，因為沒有商業的支撐，純粹以農業的自給自足，未將剩餘產品外銷，並不足以致富。加諸日本專治內陸亞細亞史名家護雅夫以為：

沿絲路東進的粟特人不僅進入了中國，還進入了蒙古高原，在那裡組成殖民聚落，他們在突厥（552-744）、回紇（744-840）等游牧國家的內部，不僅從事經濟活動，還活躍於政治及文化的舞台。⁴

-
- 1 間野英二：〈中央アジア史とシルクロード——シルクロード史觀との訣別——〉，《朝日アジアレビュー》，第9號第1卷（1978年3月），頁30-36。
 - 2 間野英二：〈中央アジア史とシルクロード——シルクロード史觀との訣別——〉，頁32。轉引自護雅夫：〈絲路和粟特人〉，收入岡崎敬等著：《絲路與佛教文化》，張桐生（譯）（臺北：業強出版社，1987年），頁188。
 - 3 間野英二：〈「シルクロード史觀」再考——森安孝夫氏の批判に関連して〉，《史林》，第91卷第2號（2008年3月），頁418。
 - 4 護雅夫：〈絲路和粟特人〉，頁198。

張廣達院士亦有如下主張：

他們（指粟特人）在長時期內操縱著絲綢之路上的國際轉販貿易，足跡遍及歐亞內陸。〔……〕成為古代歐亞內陸及其周邊國家的國際商人〔……〕他們不僅在發展東西轉販貿易上起著關鍵作用，而且在傳播文化、促進多國之間的政治往來等方面也扮演著重要角色。〔……〕在政治方面，粟特人曾經充當了突厥、回鶻等許多草原游牧汗國的政治顧問，並且作為政治使節或軍事將領來往於東西南北各國之間。⁵

就上述二位名家所言，不但足以破除間野的質疑，也帶給筆者欲進一步探求粟特人究竟在唐蕃互動關係之中，是否扮演著有如促進李唐與突厥、李唐與回紇之間關係演化的角色？粟特人是否一如進入突、回汗廷般，也進入吐蕃王廷，活躍於吐蕃的政治與文化舞台？因為既然粟特人足跡遍及歐亞內陸，為何獨漏與李唐、大食、突回等同屬歐亞內陸強權的大國——吐蕃？

由於吐蕃當代文獻傳世者幾希，欲探討上述問題，有著文獻難徵之慨。然而史學精妙之處，就在於不疑之處起疑，復於文獻所載之蛛絲馬跡當中，抽絲剝繭，找尋答案，並藉以重構過往事件的輪廓與某些細節。本文主要目的除探討上文所示之問題以外，亦欲探究唐代宗（李豫，726-779）廣德元年（763），吐蕃攻陷李唐京師，並佔領十三天的事件中，是否有粟特胡涉入其間？粟特胡在此事件究竟扮演何種角色？

貳、西元七、八世紀時期活躍於歐亞內陸的粟特人

粟特人世居中亞兩河流域之間的澤拉夫善河（Zarafshan R.）流域地區，包括撒馬爾罕（Samarkent, 古稱康國）、布哈拉（Buhara, 安國）、蘇

5 張廣達：〈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收入氏著：《西域史地叢稿初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頁249。

對沙那（Sutrushana, 東曹國）、劫布坦那（Kaputana, 曹國）、瑟底痕（Ishitkhan, 西曹國）、弭秣賀（Maymurgh, 米國）、屈霜你迦（Kushanika, 何國）、羯霜那（Kashana, 史國）、赭時（Chach, 石國）等綠洲城邦，史稱「昭武九姓」。⁶屬昭武九姓者，常取母國之古稱為其姓，以示其所出，包括康、安、曹、米、何、史、石等。

由於昭武九姓所居之地，適處東西交通之必經，粟特人利用此地利之便而世代經商，互通東西間所需之商品，並於各必經之商路上，建立移民聚落，形成粟特人經商的網絡。⁷特別是出於經商營利方便的需求，對於各地政治狀態以及當時各政權之間的關係，具有極為敏銳的觀察力，經常參與優勢的一方，試圖借著優勢獲得更多的利益。例如於清代以前，中國北方游牧民族所組成的政權，一直是中原農業朝廷的邊患，原因殆為其一：中國北方游牧民族缺乏穀物、工具、絲織品等生活物資，必須與其南方的農業社會作貿易或物資的交換。但彼此間常因交易的問題而屢生糾葛，造成雙方的困擾，南方農業社會面對困擾則關閉邊界，不與北方游牧民族作買賣，北方游牧民族則因生活所需，於物資有所需求而無法透過貿易獲得之時，就自動組織起來，至農業地區掠奪所需。其二：中國北方游牧民族位處蒙古高原，蒙古高原面積遼闊，東起於大興安嶺，西迄阿爾泰山脈，北達薩彥嶺、肯特山，南至陰山山脈。若蒙古高原諸游牧部族一統，則勢力所及之處，包括中國東北面，如隋唐時期的奚、契丹、靺鞨等都受其徵發，蒙古高原的西面，包括今天的新疆，再向西延伸至中亞，均受其統屬。蒙古高原與其南面中原農業王朝的接界，則幾乎自東迄西，綿延千餘里的界線，蒙古高原有任何統一勢力勃興，中原農業王朝勢必受到至深且重的影響。

蒙古高原歷代統一的強權，自秦漢時期的匈奴啟始，中經鮮卑、柔然，至突厥於西元五五五年攻破柔然，取而代之，稱霸蒙古高原，其領土東起遼東，西至西海，南接長城，北臨貝加爾湖，東邊征服契丹，並將其

6 榮新江：《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修訂版）》（北京：三聯書店，2014年），頁17。

7 《隋書·康國傳》記載屬昭武九姓之一的康國為：「善於商賈，諸夷交易多湊其國。」見〔唐〕魏徵等撰：《康國傳》，《隋書》（臺北：鼎文書局，1980年），卷83，頁1849。

北方的契骨（Kirkiz, 結骨、堅昆）以及西南方的吐谷渾都納入統治，⁸盛極一時，時值中原分裂的局面，北周、北齊競相爭取突厥的支持以壯聲勢，造成突厥勢陵中原。《周書·突厥傳》記載：

自俟斤以來，其國富彊，有凌轡中夏志。朝廷既與和親，歲給繒絮錦綵十萬段。突厥在京師者，又待以優禮，衣錦食肉者，常以千數。齊人懼其寇掠，亦傾府藏以給之。他鉢彌復驕傲，至乃率其徒屬曰：「但使我在南兩箇兒孝順，何憂無物邪。」⁹

上引文之「俟斤」（irkin, erkin），即攻滅柔然之木杆可汗（Muqan Khagan, 553-572 在位），時值西元六世紀中葉時期。

一、突厥優勢時期之粟特人

依上引《周書·突厥傳》所載，相對於分裂的中原，統一的突厥勢盛凌駕於中原王朝之上。按照上文所示粟特人的秉性，此時依附於強盛的突厥，與中原王朝貿易定能獲得大利。史籍對此並未有明確的記載，但在史籍相關載記的蛛絲馬跡之中，依稀能窺探出粟特人在突厥陣營中的活躍與影響力。《隋書·裴矩傳》記載：

時突厥強盛，都藍可汗妻大義公主，即宇文氏之女也，由是數為邊患。後因公主與從胡私通，長孫晟先發其事，矩請出使說都藍，顯戮宇文氏。上從之。竟如其言，公主見殺。¹⁰

另《隋書·長孫晟傳》對同一事件有更為詳細的載記：

（開皇）十三年（593），流人楊欽亡入突厥，詐言彭公劉昶共宇文氏女謀欲反隋，稱遣其來，密告公主。雍閭信之，乃不修職貢。又遣晟出使，微觀察焉。公主見晟，乃言辭不遜，又遣所私

8 林恩顯：《突厥研究》（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年），頁2。

9 〔唐〕令狐德棻等撰：《突厥傳》，《周書》（臺北：鼎文書局，1980年），卷50，頁911。

10 〔唐〕魏徵等撰：《裴矩傳》，《隋書》，卷67，頁1578。

胡人安遂迦共欽計議，扇惑雍閭。晟至京師，具以狀奏。又遣晟往索欽，雍閭欲勿與，謬答曰：「檢校客內，無此色人。」晟乃貨其達官，知欽所在，夜掩獲之，以示雍閭，因發公主私事，國人大恥。雍閭執遂迦等，並以付晟。¹¹

上二引文所指隋大義公主所私胡人安遂迦，觀其安姓即知似出自中亞布哈拉的粟特胡。雍閭乃突厥都藍可汗（587-599 在位）之名。據《隋書·長孫晟傳》所載，安遂迦於大義公主慫恿都藍可汗反隋一事，似扮演獻策謀士的角色。由上引《隋書》二傳所載看來，似乎大義公主私通粟特胡為單一事件，事實上，吾人從另一史籍之載記，可以瞭解於突厥人周遭充斥著粟特人的身影。《通典·邊防十三·突厥》載云：

思摩者，頡利族人也。始畢（609-619 在位）、處羅（619-620 在位）以其貌似胡人，不類突厥，疑非阿史那族類，故歷處羅、頡利（620-630）代，常為夾畢特勤，終不得典兵為設。¹²

依上引文，思摩（583-647）歷經處羅、頡利二任可汗皆未受到重用，原因在於其外貌極似粟特胡所致。思摩姓阿史那為頡利可汗氏族，係承繼自其父，倘若思摩之母為突厥女，則其外貌應同於一般突厥人，然而思摩外貌卻與粟特胡相似，思摩之父可能另娶有粟特女或私通粟特女，¹³而生下了思摩。若以此可能性推敲，其父生思摩之時間，依思摩於處羅時期已長大成人算來，其父與粟特女往來之時間，可能在都藍可汗在位的時期。¹⁴按突厥素有子以母貴的習俗，¹⁵思摩之母可能為粟特女，受出身影響，致未受到重

11 〔唐〕魏徵等撰：《長孫晟傳》，《隋書》，卷 51，頁 1332。

12 〔唐〕杜佑：《邊防十三·北狄四·突厥上》，《通典》（臺北：新興書局，1963 年），卷 193，頁 1071。

13 粟特人因遠赴他鄉經商，與他族通婚事例頗見於史籍，例如《資治通鑑》於玄宗天寶十一載（752）十二月記載安祿山對哥舒翰云：「我父胡，母突厥，公父突厥，母胡〔……〕」，上引文顯見安祿山及哥舒翰均屬粟特胡與突厥通婚的結晶。詳見〔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鑑》（臺北：遼寧出版社，1980 年），卷 216，「玄宗天寶十一載十二月」條，頁 6916；另見程越：《粟特人在突厥與中原交往中的作用》，《新疆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22 卷第 1 期（1994 年 2 月），頁 63。

14 護雅夫：《古代トルコ民族史研究 I》（東京：山川出版社，1967 年），頁 68。

15 〔唐〕魏徵等撰：《突厥傳》，《隋書》，卷 84，頁 1865。記載：「及佗鉢卒，國中

用。吾人將思摩父似娶或私通粟特女一事，與大義公主私通安遂迦合觀，可以見得當時粟特人於突厥活躍的景況。

另《隋書·禮儀志》記載：

大業三年（607）正月朔旦，大陳文物。時突厥染干朝見，慕之，請襲冠冕。帝不許。明日，率左光祿大夫、禱但特勤阿史那職御，左光祿大夫、特勤阿史那伊順，右光祿大夫、意利發史蜀胡悉等，並拜表，固請衣冠。帝大悅，謂弘等曰：「昔漢制初成，方知天子之貴。今衣冠大備，足致單于解辮，此乃卿等功也。」¹⁶

上引文中之「意利發史蜀胡悉」，觀其名號，「意利發」應為其突厥官稱 *iltäbir* 或 *eltäbir*，係別部族（非可汗之族）首長官稱的漢譯；¹⁷「史蜀胡悉」為人名，名字第一字為「史」，顯屬出自中亞史國的粟特胡。史蜀胡悉能與二位姓阿史那氏的特勤高官一起隨染干（即啓民可汗，599-609 在位）晉見隋煬帝（楊廣，569-618），可見其應為啓民可汗之心腹。其後，史蜀胡悉仍受繼啓民可汗後立位的始畢可汗之寵信，並發揮其影響力。有關史蜀胡悉之事跡，熟悉突厥內部情勢之隋臣裴矩（547-627）云：

突厥本淳易可離間，但由其內多有羣胡，盡皆桀黠，教導之耳。臣聞史蜀胡悉尤多姦計，幸於始畢，請誘殺之。」帝曰：「善。」¹⁸

裴矩上言，直指突厥可汗身邊多粟特胡擔任謀士，以其廣博的見聞及敏銳的觀察為可汗獻策，致可汗不再受隋的左右，其中尤以史蜀胡悉為代表，由是裴矩建議煬帝以計除之。煬帝同意。《隋書·裴矩傳》續載其事云：

矩因遣人告胡悉曰：「天子大出珍物，今在馬邑，欲共蕃內多作

將立大邏便，以其母賤，眾不服。菴羅母貴，突厥素重之。」依上引文所述，由是得知突厥重母族之氏族名望。

16 〔唐〕魏徵等撰：《禮儀志》，《隋書》，卷12，頁279。

17 林恩顯：《突厥研究》，頁88。

18 〔唐〕魏徵等撰：《裴矩傳》，頁1582。

交關。若前來者，即得好物。」胡悉貪而信之，不告始畢，率其部落，盡驅六畜，星馳爭進，冀先互市。矩伏兵馬邑下，誘而斬之。詔報始畢曰：「史蜀胡悉忽領部落走來至此，云背可汗，請我容納。突厥既是我臣，彼有背叛，我當共殺。今已斬之，故令往報。」始畢亦知其狀，由是不朝。¹⁹

據上引文，裴矩故使人放內幕消息給史蜀胡悉，謂以隋大內之大批珍貴物品將出售，激發史蜀胡悉身為粟特胡的本能，欲搶得先機冀圖大利。於是史蜀胡悉率部眾「盡驅六畜，星馳爭進，冀先互市」，上引文將粟特胡爭利的性格，描繪得淋漓盡致。讀史至此，不由得聯想到玄奘（602-664）西行之時也親眼目睹粟特胡同樣的行徑，玄奘云：

時同侶商胡數十，貪先貿易，夜中私發，前去十餘里，遇賊劫殺，無一脫者。比法師等到，見其遺骸無復財產，深傷歎焉。漸去遙見王都，阿耆尼王與諸臣來迎延入供養。²⁰

由上引文所提及商胡數十遇害地點，靠近阿耆尼國，即今新疆焉耆附近，是為東西貿易所經的路徑之一。此商胡數十應為同行商胡大隊之一部份，為搶貿易先機而於夜半脫隊私自出發而遭盜賊劫殺。吾人觀唐代玄奘所云之商胡為爭貿易先機，以圖利之情景，與隋代史蜀胡悉為爭利而遭誘殺，竟如出一轍。

至始畢可汗在位時期（609-619），另有一粟特胡亦受突厥重任，《舊唐書·突厥傳》記載：

高祖起義太原，遣大將軍府司馬劉文靜聘于始畢，引以為援。始畢遣其特勤康稍利等獻馬千匹，會于絳郡，又遣二千騎助軍，從

19 〔唐〕魏徵等撰：〈裴矩傳〉，頁1582。

20 〔唐〕慧立、彥棕：《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收入《大藏經》，史傳部二（臺北：新文豐出版，1983年），第2卷，頁226。

平京城。及高祖即位，前後賞賜，不可勝紀。²¹

《資治通鑑》所載則與上引《舊唐書·突厥傳》稍有不同，其於隋恭帝義寧元年（617）六月丙申記載：

突厥遣其柱國康鞘利等，送馬千匹詣李淵為互市，許發兵送淵入關，多少隨所欲。丁酉，淵引見康鞘利等，受可汗書，禮容盡恭，贈康鞘利等甚厚。擇其馬之善者，止市其半〔……〕。²²

上二引文指涉同一事件，卻有所迥異。一載為特勤康稍利，一載為柱國康鞘利；一載為獻馬，一載為送馬互市。有關此疑義，可較之於唐人溫大雅（572-629）所著《大唐創業起居注》所載，分辨二者之曲直：

〔……〕於是遣使以眾議馳報突厥。始畢依旨，即遣其柱國康鞘利、級失熱寒特勤、達官等，送馬千疋來太原交市，仍許遣兵送帝往西京，多少惟命。²³

據上溫大雅所示，《資治通鑑》所載幾與之相近。由此可見《舊唐書·突厥傳》此處所載，顯有舛誤。總之，粟特胡康鞘利似受突厥可汗的寵信，按上引諸史料所載，突厥使節團以康鞘利為首，其排名還在「級失熱寒特勤」之前，可見其地位之高。

突厥時至頡利可汗在位（620-630），國勢逐漸下滑，不復往日。李唐張公瑾（594-632）於唐廷剖析可攻取突厥之五點理由時，其中第五點理由為：

頡利疏其突厥，親委諸胡，胡人翻覆，是其常性，大軍一臨，內

21 〔後晉〕劉昫：〈突厥傳上〉，《舊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76年），卷194上，頁5153。

22 〔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184，「隋恭帝義寧元年六月丙申」條，頁5740。

23 〔唐〕溫大雅：《大唐創業起居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卷1，頁8。按引文中之「級失熱寒」，應為突厥所遣特勤之名。因為突厥官稱之中，似無類「級失」、「熱寒」之官稱，因此應斷句為「級失熱寒特勤」。

必生變，其可取五也。²⁴

《舊唐書·突厥傳》亦載：

頡利每委任諸胡，疏遠族類，胡人貪冒，性多翻覆，以故法令滋彰，兵革歲動，國人患之，諸部攜貳。²⁵

上二引文俱言頡利可汗重用粟特人的弊端叢生，不得人心的狀況。果不其然，當太宗於貞觀四年（630）遣大軍討伐頡利可汗，頡利兵敗勢蹙之時，突厥內部分崩離析，突厥所屬粟特部立即有所反應，《舊唐書·突厥傳》記載：

（貞觀）四年正月，李靖進屯惡陽嶺，夜襲定襄，頡利驚擾，因徙牙於磧口，胡酋康蘇密等遂以隋蕭后及楊政道來降。²⁶

然而《舊唐書·李靖傳》卻有不同於前者的記載，其云：

突厥諸部離叛，朝廷將圖進取，以靖為代州道行軍總管，率驍騎三千，自馬邑出其不意，直趨惡陽嶺以逼之。頡利可汗不虞於靖，見官軍奄至，於是大懼，相謂曰：「唐兵若不傾國而來，靖豈敢孤軍而至。」一日數驚。靖候知之，潛令間諜離其心腹，其所親康蘇密來降。四年，靖進擊定襄，破之，獲隋齊王暕之子楊正道及煬帝蕭后，送于京師，可汗僅以身遁。²⁷

比較上二引文，《舊唐書·李靖傳》所載較《舊唐書·突厥傳》為詳，後者內容似經刪削縮減而成，除此外，二者主要不同處，在於《舊唐書·突厥傳》云康蘇密等以蕭后（566-648）及楊政道（618-？）來降；而《舊唐書·李靖傳》則云康蘇密先降，李靖（571-649）破突厥後，方捕獲蕭后及

24 〔後晉〕劉昫：〈張公瑾傳〉，《舊唐書》，卷68，頁2507。

25 〔後晉〕劉昫：〈突厥傳上〉，頁5159。

26 〔後晉〕劉昫：〈突厥傳上〉，頁5159。

27 〔後晉〕劉昫：〈李靖傳〉，《舊唐書》，卷67，頁2479。

楊政道。由於二者所載有詳略之分，孰正孰誤，難有定論。一般而言，載記愈詳者，愈能獲致判斷正誤的機會。然而，康蘇密降於李唐，似應於投降的當口，帶些李唐所喜之「伴手禮」，呈奉李唐，試圖取得李唐的信任，並獲得好處。若以此觀點考量，綜合上二引文所載可知，來自中亞康國的粟特人康蘇密係頡利可汗的親信心腹，其於李唐與突厥對峙之際，優勝劣敗即分之時，面對情勢急劇變化、倉促之間，立即應變圖求自保，遂挾持隋齊王暕之子楊正道及煬帝蕭后，向李唐投誠。上二引文顯示出其一，粟特胡康蘇密確屬突厥層峰階級，取得高位，受到信任，否則無法於第一時間即能控制住投靠於突厥的楊隋王室後裔；其二，康蘇密對於楊隋、突厥與李唐三者關係之理解，可謂已達極為熟稔程度，若平日未涉入高層的政治活動，無法得知三者關係之內幕，也無法於倉促之間，作如此機巧之應變。

二、李唐優勢時期之粟特人

就上文所引諸史籍之載記，吾人可以瞭解至少自都藍可汗時期（587-599 在位），直至頡利可汗（620-630 在位）止，粟特人確曾活躍於突厥政治、社會、經濟之舞台，且影響及突厥與中原王朝之間關係的發展。隨著突厥勢力的崩解，原定居於突厥之粟特人紛紛內徙至李唐境內，重演遷居於優勢一方的戲碼。就如同榮新江（1960-）所言，唐朝建立後，不少粟特人入仕唐朝，而唐朝的統一也為粟特人的經商活動創造了條件，²⁸原雄霸大漠南北及華北地區之突厥挫敗後，粟特人徙至唐境者更見暢旺。彼等遷徙入唐的路線與沿途建立之聚落，係沿著華北與漠南之間的半農半牧地帶延展，²⁹其中最大的聚居區在於唐高宗調露元年（679），於靈州、夏州之南所設置之魯、麗、含、塞、依、契等六胡州。³⁰按粟特胡所遷徙入唐之農牧交接地帶，原本就是利用於不同生產型態的生民之間，作為互通二者有無的中介者，以及運用其廣博的見聞，圖獲貿易之利。例如《資治通鑑》於

28 榮新江：《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修訂版）》，頁 105。

29 詳見榮新江：《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修訂版）》，頁 36，圖 3「粟特移民遷徙路線圖」。

30 〔北宋〕歐陽修、宋祁：〈地理志一〉，《新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76 年），卷 37，頁 975。

唐玄宗開元四年（716）記載：

有胡人上言海南多珠翠奇寶，可往營致，因言市舶之利；又欲往師子國求靈藥及善醫之嫗，寘之宮掖。³¹

上引文就是粟特人欲以所聞所見提供皇上，試圖借由皇上之命獲得朝廷支持經營權目的之例。另一方面，更有粟特人官至李唐戶部尚書者，如安思順（695?-756）。³²

然粟特胡對李唐影響最大者，當屬唐玄宗天寶十四載（755）的安史之亂。掀起安史亂事的首腦安祿山（703-757），以及與其齊名之史思明（703-761），俱屬李唐境內營州柳城之粟特胡。³³彼等之所以能聚集同類，形成「幽州軍事集團」，完全是因先前大批遷徙至突厥境內生活的粟特胡，於貞觀四年（630）突厥滅亡後，轉投於李唐，由李唐安置於幽州到靈州之地區，至調露元年（679）於靈、夏南境置魯、麗、含、塞、依、契等六州，即所謂之「六胡州」，此於前文已述。至武周萬歲通天元年（696），武則天因契丹陷營州，調動包括六胡州之內的精兵往救營州，³⁴此為營州粟特胡的由來，而安、史所出身的柳城就是位於營州之內之粟特聚落。³⁵

安祿山為蓄積反唐的資源與力量，外結唐廷官宦與失意士人，內聚同其族類的諸胡。特別是為防反唐跡象外洩，其內部必須以同心同德的同一族類精英，作為其核心。據榮新江的匯整，這些精英包括安慶緒、安慶宗（723-759）、安忠臣、安忠順、何千年、何思德、史定方、安思義、安岱、康杰、康阿義屈達干、康節、曹閏國、何元迪、安神威、安太清、安武臣、安雄俊、史思明、史朝義、康沒野波、康文景、曹將軍、何數、何

31 〔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211，「玄宗開元四年五月甲辰」條，頁6718。

32 〔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217，「肅宗至德元載三月乙卯」條，頁6957。

33 榮新江：《中古中國與粟特文明》，頁274-282。

34 詳見〔唐〕陳子昂：〈上軍國機要事八條〉，《陳伯玉文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第615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年），卷8，頁69。

35 榮新江：《中古中國與粟特文明》，頁278-279。

令璋、石帝廷、康孝忠、康某等等。³⁶由此可見，所謂「安史之亂」，實為李唐境內的粟特胡為主體，所發動的一次欲推翻李唐王朝，取而代之的叛亂。

安史之亂持續八年（755-762），戳破李唐天下太平、國力充沛的假象，進而因戰亂而破壞了李唐國力與形象，使得李唐對外無法維繫原有天可汗的威勢，遭受到部份週邊諸國的挑戰與侵軼，對內則朝廷無法掌控全局，財經隳敗，社會動盪。從此李唐已如江河日下，不復往日雄風，對內對外風波不斷。學界原由日本京都學派主張中國歷史的演進有所謂「唐宋變革」的現象，即由唐朝演進到宋朝，不論在政治、社會、經濟、對外關係等各方面，都產生變革性的變化。例如在政治上，由唐三省制衡皇權到宋代皇權的提昇，而演進至君主專制與士大夫政治；在社會上，由貴族壟斷的門第社會到宋科舉出身或士人為主的科第社會；在對外關係上，則由唐天朝自居的不平等對待週邊諸國，到宋朝與週邊諸國平起平坐等等；將之視為由中古時期演進至近世時期的特徵。³⁷但實際上，有學者以為當安史亂作開始，唐朝威勢不再，就已經開始朝「唐宋變革」的現象邁進，因此應稱之為「天寶變革論」。³⁸筆者則寧稱之為「安史亂前後變革」。

三、回紇優勢時期之粟特人

當突厥、李唐先後勢衰之際，回紇應時而起，北亞、東亞局勢丕變。李唐為求儘快收復兩京，並穩定北亞不使乘亂內侵，遂以提高回紇地位進而與唐對等、嫁與肅宗皇帝（李亨，711-762）親生公主，以及進行絹馬交易等等措施，換得回紇的支持。回紇得到李唐所給予諸多好處，遂不出兵南侵，穩住唐回邊境，不生烽煙，進而出援騎兵助唐收復兩京，平定安史之亂。此時，唐回之間因李唐亟需回紇之奧援，顯然回紇要佔優勢。此在長於評估北亞與東亞政局的粟特人而言，又是可利用的時機，依附於優勢一方，對另一方進行貿易，以圖大利。於是粟特人活躍於回紇汗庭，就如

36 榮新江：《中古中國與粟特文明》，頁 279-282。

37 詳見柳立言：〈何謂「唐宋變革」？〉，收入氏著：《宋代的家庭和法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頁 5-42。

38 榮新江：《中古中國與粟特文明》，頁 266。

同活躍於突厥汗廷般，發揮其影響力。例如《資治通鑑》有著較為詳細且生動的記載，其云：

及代宗崩，上遣中使梁文秀往告哀，登里驕不為禮。九姓胡附回紇者，說登里以中國富饒，今乘喪伐之，可有大利。登里從之，欲舉國入寇。³⁹

上引文所指之「九姓胡附回紇者」，即為登里可汗（?-780）身邊的粟特胡策士，彼等勸進登里可汗利用李唐有喪，進寇李唐可有大利。此事為頓莫賀達干所阻，並因而發動了一場血腥的政變，擊殺登里可汗並九姓胡二千人，自立為可汗。⁴⁰換言之，回紇汗庭中的粟特胡竟然引發了汗庭中的矛盾與衝突。據唐德宗時期（李适，742-805，779-805 在位）官拜振武留後之張光晟（?-784），曾上奏朝廷形容回紇與其境內粟特胡之關係時云：「回紇本種非多，所輔以強者，群胡耳。」⁴¹張光晟上言指出回紇之盛，實與粟特胡經常獻策輔佐回紇可汗有關。

在唐回經貿方面，唐回間絹馬交易的產生，乃由於李唐原有河西、隴右等養馬區失陷於吐蕃後，為因應對內對外之戰爭，需大量戰馬；而回紇本身產馬，但對李唐的絹帛則有所需求，除回紇貴族本身之需求外，另亦將絹帛輸往西方圖利。按粟特胡長年壟斷東西貿易，⁴²對於當時唐回間各自的需求，具敏銳生意頭腦的粟特人焉有不預先察覺的道理？吾人於唐回絹馬交易之中，是否有粟特人穿梭其間，扮演主導之要角，史無明言，不得而知。但在史籍蛛絲馬跡的載記之中，仍可略窺一二，例如《資治通鑑》於唐代宗大曆八年（773）記載：

回紇自乾元（758-759）以來，歲求和市，每一馬易四十緡，動至

39 〔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226，「德宗建中元年六月甲午朔」條，頁7282。

40 〔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226，「德宗建中元年六月甲午朔」條，頁7282。

41 〔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226，「德宗建中元年八月甲午」條，頁7288。

42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編）：《西域：中外文明交流的中轉站》（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81。另見榮新江：〈絲綢之路上的粟特商人與粟特文化〉，收入氏著：《絲綢之路與東西文化交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233-234。

數萬匹，馬皆驚瘠無用；朝廷苦之，所市多不能盡其數，回紇待遣、繼至者常不絕於鴻臚。〔……〕秋，七月辛丑，回紇辭歸，載賜遺及馬價，共用車千餘乘。⁴³

上引文所指為回紇於絹馬交易之中的獲利，以及回紇每年來市馬之使者人數眾多的情景。據《資治通鑑》於代宗大曆十四年（779）七月庚辰記載：

詔回紇諸胡在京師者，各服其服，無得效華人。先是回紇留京師者常千人，商胡偽服而雜居者又倍之。縣官日給饔餼，殖貲產，開第舍、市肆，美利皆歸之，日縱貪橫，吏不敢問。或衣華服，誘取妻妾，故禁之。⁴⁴

依上引文所示，粟特人實際上乃滲雜於回紇使者之中，且倍於回紇使者人數。此情此景隱然指出粟特人確實利用唐回絹馬交易，牟得利益，大賺其財。《資治通鑑》更於德宗建中元年（780）記載：「代宗之世，九姓胡常冒回紇之名，雜居京師，殖貨縱暴，與回紇共為公私之患。」⁴⁵於上述之例證，吾人似可確定，縱使唐回絹馬交易之促成，可能並非由粟特胡從中推動，但粟特人確實於唐回絹馬交易之中，與回紇合作，從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日本學者森安孝夫（1948-）亦有類似看法，其於《シルクロードと唐帝国》一書中以為，回紇於安史亂興之際，以強大的騎兵入援李唐，而取得對唐外交的優勢，粟特商人藉機與回紇合作，粟特商人狐假虎威，借著回紇之虎威，在李唐與回紇之間大展鴻圖，以絹馬交易方式壟斷了絲路貿易之利益。⁴⁶誠哉斯言。

參、吐蕃勢盛時期粟特人之動向

吐蕃早於祿東贊（mGar stong rtsan yul zung, ?-667）攝政時期（650-

43 〔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 224，「代宗大曆八年五月辛卯」條，頁 7221。

44 〔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 225，「代宗大曆十四年七月庚辰」條，頁 7265。

45 〔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 226，「德宗建中元年八月甲午」條，頁 7287。

46 森安孝夫：《シルクロードと唐帝国》（東京：講談社，2016 年），頁 280。

667)，即已策劃並實踐對外擴張政策，往後吐蕃歷朝贊普如都松芒布杰（vDus srong mang po rje, 676-704 在位）、墀德祖贊（Khri lde gtsug btsan, 705-754 在位）、墀松德贊（Khri srong lde btsan, 755-796 在位）等，均仍秉持對外擴張政策，向外積極開疆闢土，直至唐玄宗開天年間，吐蕃王朝整體態勢已形成核心為位於邈些的吐蕃贊普，轄下除吐蕃本部外，另以藩國方式統轄工布（rKong po）、娘布（Myang po）與吐谷渾（vA zha），再另立青海道軍區掌控整個青海地區；以和親方式羈縻西突厥、突騎施、小勃律等；以聯盟方式聯結大食；以兄弟之邦控制南詔；如是統有部份西域以及青海、西康、南詔等，⁴⁷而與李唐相對峙於青海湖東南日月山一線。此時，唐蕃雙方勢力相當，互有勝負，呈現拉鋸的局面。

然而，李唐於玄宗天寶十四載（755）十一月爆發安史亂之後，影響所及，李唐國內陷入戰亂，社會動盪，生產失序，國力大減。唐廷為求早日收復兩京，恢復秩序，以求早日平定安史，下令河隴、朔方之邊防軍入靖國難。吐蕃乘隙落井下石，大舉進犯唐境。於肅宗至德元載（756），吐蕃攻陷李唐威戎、神威、定戎、宣威、制勝、金天、天成等軍（以上諸軍轄於隴右節度使），以及石堡城、百谷城、雕窠城（今青海同仁縣境）以及崑州（今西昌）等地；⁴⁸於至德二載（757）十月陷西平；⁴⁹乾元元年（758）陷河源軍（今青海西寧附近）；⁵⁰上元元年（760）陷臨洮西之神策軍及廓州（約今青海貴德、化隆西一帶）。⁵¹至代宗廣德元年（763），吐蕃入大震關，李唐西北諸州之地，包括蘭、廓、河、鄯、洮、岷、秦、成、渭等州皆陷，吐蕃盡下隴右地。⁵²數年之間（756-763）吐蕃鯨吞蠶食唐境的結果，唐蕃的邊界為今陝西省中部之隴坻，據《資治通鑑》形容

47 林冠群：《玉帛干戈——唐蕃關係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6年），頁320。

48 〔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219，「肅宗至德元載十二月是歲」條，頁7011。另見 Ariane Spanien & Yoshiro Imaeda, *Fonds Pelliot Tibétain in Choix de Documents Tibétains conservés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1979), Vol. 2, B.M. Or. 8212 (187), pl. 592. 第21-22行。

49 〔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220，「肅宗至德二載十月」條，頁7038。

50 〔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220，「肅宗乾元元年是歲」條，頁7066。

51 〔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221，「肅宗上元元年八月」條，頁7096、「肅宗上元元年是歲」條，頁7102。

52 〔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223，「代宗廣德元年七月」條，頁7146。

為：「自鳳翔以西，邠州以北，皆為左衽矣。」⁵³在此形勢下，吐蕃的威脅籠罩著李唐京畿，而粟特胡所聚集之鹽、靈、夏諸地，遂成為北防回紇，西禦吐蕃的重地而陷入重重的爭戰之中。⁵⁴

就如同先前生活於突厥境內的粟特胡般，在面臨兩方勢力的拉扯之中，粟特胡較易倒向勢盛且很有可能獲勝的一方。因此在唐蕃激戰的當下，唐方敗多勝少，大批土地遭吐蕃侵佔的情況下，居住於原李唐河西、隴右地，以及鹽、靈、夏等地的部份粟特胡，或因陷落來不及走脫，或因保全生命財產而投入吐蕃陣營者，或因吐蕃相對於李唐而言，優勢已成，原居於沿天山南路至河西走廊等地之粟特胡，均陷於吐蕃統治之下，而成為吐蕃之子民。事實上，粟特人對吐蕃應不陌生，因為吐蕃於控制青海地區前後，即已大舉進入西域，與大食、西突厥、李唐等競逐西域的霸權，而且粟特人由中亞前往印度經商，有時亦需途經吐蕃，例如若翻越帕米爾高原走印度河上游區，進入印度西北部，就需途經吐蕃之實質控制區，此於今拉達克地區的德蘭茨村所發現的石刻中，有一段粟特銘文載曰：

二百一十年，來自撒瑪爾罕（Samarkander）的諾斯凡作為大使，
致吐蕃可汗（khagan）。⁵⁵

另於印度河上游流域亦發現有以粟特語雕製的碑刻，⁵⁶上述石刻銘文即可證明粟特與吐蕃之往來。基於以上諸多緣故，不論是中亞的粟特人，或是帕米爾高原以西經天山南路至河西走廊的所有粟特胡，對於吐蕃並不陌生，而且可謂交手已久。

按吐蕃崛起以後，其與周邊諸國之相處模式，就史籍所載，與北方游牧汗國有很大的不同。北方游牧汗國雖經常於秋天南下牧馬，但平日與農

53 〔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 223，「代宗廣德元年七月」條，頁 7146。

54 張廣達：〈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頁 258-260。

55 G. Uray, "Tibet's connections with Nestorianism and Manicheism in the 8th-10th Centuries," in Ernst Steinkellner & Helmut Tauscher (eds.), *Contributions on Tibetan Language, History and Culture* (Delhi: Motilal Banarasisdass Publishers, 1983), p. 406.

56 N. Sims-Williams, "The Sogdian Inscriptions of the Upper Indus: A Preliminary Report," in Karl Jettmar (ed.), *Antiquities of Northern Pakistan: Reports and Studies*, Vol. 1 (Mainz: P. von Zabern, 1989), pp. 131-137.

業地區以物易物之貿易，卻屬經常性的活動，此稱為「互市」，史籍不乏其載。⁵⁷然而吐蕃卻完全不同。吐蕃有擴張領土的欲望，不但搶佔土地且以劫掠物資、人口為主，似乎與外族的貿易還在其次。例如吐蕃與李唐互動有二百餘年（大約西元 634 年至 842 年），史籍載及唐蕃互市竟然僅有二次，一次為唐玄宗開元十九年（731）九月，吐蕃遣其相論尚它碑要求於赤嶺（今青海日月山）互市；⁵⁸另一次為唐憲宗（李純，778-820）元和十年（815）十一月，吐蕃請求於隴州邊界互市。⁵⁹筆者以為唐蕃之間經貿活動甚少入史的原因，可能有如下四點原因：其一，可能因頻繁的使節團派遣，隨著使節團所攜貨品，作「變相的小規模互市」；其二，唐蕃之間的承平時期，唐蕃邊境民眾的互通有無，應屬正常且自然之現象，然而唐蕃之間承平日少，戰爭日多；其三，吐蕃藉由戰爭手段，劫掠李唐邊區百姓的物資，並擄掠人口入蕃等，此現象符合中原西陲氐羌系部族，乃至於西藏高原部族的習性，以掠奪為生產輔助手段之一，⁶⁰此為蕃唐邊境互動的普遍現象；其四，吐蕃透過與李唐的盟會，藉李唐有所求之機，向唐方要素所需之物資，如絹帛等。上述四種管道，特別是透過邊境戰爭所附帶的掠奪行為，佔了大部份的比例，因此在唐蕃雙方的正常經貿關係的建立，站在吐蕃的立場上，似無需太在意，這也從史籍較少記載雙方經貿活動之中反映出來的現象。⁶¹雖然有上述原因導致史籍正式記載唐蕃互市為稀罕之事，但仍足以證明吐蕃的擴張實意在土地的佔有，其他的利益似乎仍在其次。

張廣達院士（1931-）亦有相似的見解，其於檢視敦煌文獻所載吐蕃佔

57 例如〔西漢〕司馬遷：〈匈奴列傳〉，《史記》（臺北：鼎文書局，1976年），卷110記載：「孝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匈奴，遣公主，如故約。〔……〕今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通關市，饒給之。〔……〕然匈奴貪，尚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尚關市不絕以中之。」另札奇斯欽教授對此亦有精闢的見解，詳見氏著：《北亞游牧民族與中原農業民族間的和平戰爭與貿易之關係》（臺北：正中書局，1972年），頁361-381。

58 〔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213，「玄宗開元十九年秋九月辛未」條，頁6796。

59 〔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239，「憲宗元和十年十一月己丑」條，頁7720。

60 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擇：面對漢帝國的北亞游牧部族》（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9年），頁184-188。另見林冠群：《唐代吐蕃宰相制度之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5年），頁62-65。

61 林冠群：《玉帛干戈——唐蕃關係史研究》，頁598-599。

領敦煌以後的作為，曾歸納出相當精煉的結論云：

在吐蕃統治（敦煌）時期，吐蕃徵課實物，排擠商業，擅長經商的昭武九姓肯定是受到壓抑〔……〕。⁶²

張院士上言點出了吐蕃於佔領東段絲路以後，實際上只意在佔領土地擴張疆域，並未著意於經貿的利益上，因此，在吐蕃治下的銳意於經商獲利之粟特胡，遂處於「無用武之地」的狀況。是以大陸學者楊銘（1952-）亦因之推測以為，西域的粟特人與吐蕃可能始終處於敵對狀況。⁶³然而所謂「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於吐蕃治下的粟特人就不得不適應吐蕃當局的作風，一些粟特人接受吐蕃的徵召，擔任了地方官員，諸如都督（tog dog）、副千戶長（stong zla）、部落水官（sdevi chu ma ngan）、部落營田官（sdevi zhing dpon）等職官。⁶⁴既然吐蕃治下的粟特人，並不排斥為吐蕃王朝效勞，諒亦有粟特人活躍於吐蕃中央，只是史籍未載，亦未見及史料上有明確的直接證據。然而就個別人物之姓氏、事蹟上，或可推敲出其族屬為粟特胡的可能性，而且在唐蕃關係上曾發揮相當大的影響力。此人物可能就是曾於西元七八二年至七八三年，官拜吐蕃首席宰相的恩蘭達札路恭（Ngan lam stag sgra klu khong）。

肆、恩蘭達札路恭疑似粟特胡論析

吾人於相關史籍的載記中，發現至少有五處疑點，讓筆者懷疑恩蘭達札路恭並非出自於吐蕃本土的氏族。首就其姓氏恩蘭（Ngan lam）而言：按 ngan 字為名詞，意為惡、不幸、污辱，⁶⁵是為具負面意義的單字，由 ngan 字所衍生的詞彙亦全屬負面意義的語詞，諸如 ngan vgro（惡道）、ngan ngon（惡、卑鄙）、ngan pa（惡、劣、醜、謗人者、卑鄙粗下者）

62 張廣達：〈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收入氏著：《西域史地叢稿初編》，頁 267。

63 楊銘：〈唐代吐蕃與粟特關係考述〉，《西藏研究》，2008 年第 2 期（2008 年 4 月），頁 7。

64 詳見楊銘：〈唐代吐蕃與粟特關係考述〉，頁 7-8。

65 楊質夫：《藏漢小辭典》（臺北：蒙藏委員會，1976 年），頁 151。

等。⁶⁶lam 字則為道路、行程。⁶⁷ngan lam 二字合觀則其本義為：「惡習、放縱、行為卑鄙」，⁶⁸於張怡蓀（1893-1983）所編之《藏漢大辭典》上則解作：「邪道、歧途、墮入歧途」。⁶⁹筆者以為吐蕃貴族焉有取姓意含如是負面低劣者，因此 Ngan lam 可能是蕃文音譯，而非吐蕃貴族原有的姓氏。而且吾人查閱相關史籍，如《賢者喜宴》所著錄〈墀德松贊興佛證盟詔書〉中，參與興佛盟誓的全體臣工之所屬氏族，計有三十二支之多，竟然未有恩蘭氏（Ngan lam）之蹤跡，⁷⁰Ngan lam 既於墀松德贊時期立有大功，且曾擔任首席宰相，位極人臣，理當於墀松德贊（742-797）之子墀德松贊（764-815）繼立時，支持朝廷弘佛政策，然於當時朝廷最重大之盟誓場合竟然缺席，其中蘊涵有重大意義，即 Ngan lam 氏家族並非佛教徒，而是不支持佛教信仰的異教徒。另於同上書所載吐蕃十八采邑之中，享有采邑的十八支氏族之中，亦無恩蘭氏的蹤影；⁷¹又如《賢者喜宴》與《五部遺教》所登載吐蕃軍事建制各翼（ru）及各千戶（stong sde）官員名錄之中，恩蘭氏族亦渺無蹤跡。⁷²上述所提及各種職位、享有采邑的吐蕃氏族，總計有七十支，竟無恩蘭氏族的存在。此是否意味著恩蘭氏族屬外來者，並非吐蕃本土固有的氏族，因而無法享有本土氏族應有的特權，與贊普王室所賜之恩典，必須極力爭取立功的機會，以便獲得贊普的賞識與恩賜，值得推敲。

另一方面，從藏語 Ngan lam 的發音上看，Ngan 是否可能是粟特胡「安」姓的藏語譯音？此由敦煌文獻所著錄粟特人擔任敦煌地方官員的姓名中看到，所有「安」姓均書寫以藏文「Van」，⁷³並非以「Ngan」字呈

66 楊質夫：《藏漢小辭典》，頁 151。

67 楊質夫：《藏漢小辭典》，頁 564。

68 楊質夫：《藏漢小辭典》，頁 151。

69 張怡蓀（主編）：《藏漢大辭典》（北京：民族出版社，1993年），頁 648。

70 dPav bo gtsug lag vphreng ba, *Chos vbyung mkhas pavi dgav ston* 《賢者喜宴》(New Delhi: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Indian Culture, 1962), 葉 129 上第 3 行-葉 130 下第 7 行。

71 dPav bo gtsug lag vphreng ba, *Chos vbyung mkhas pavi dgav ston* 《賢者喜宴》，葉 19 下行 3-5。

72 dPav bo gtsug lag vphreng ba, *Chos vbyung mkhas pavi dgav ston* 《賢者喜宴》，葉 20 上行 4 至葉 20 下行 1。另見 G. Tucci, *Tibetan Painted Scrolls*, Vol. 3 (Suffolk, GB: Antique Collectors Club Ltd., 1949), pp. 737-738.

73 例如副都督安本義 (to dog vog pon Van bung yig)、安興子 (Van hing tse) 等，詳見 P.T. 1089 第 12、64 行。P.T. 1089 轉引自王堯、陳踐：〈吐蕃職官考信錄〉，《中國藏

現。然而，筆者以為敦煌文獻所記載的對象，是居住於敦煌地區的粟特人，彼等已大部取用漢式名字，或以漢語譯粟特名之音而取字，因此敦煌文獻所載者，係以漢字「安」的發音，以藏語 Van 來表達；設若以藏語直接音譯粟特語，而非透過漢字「安」，如此是否仍以 Van 來呈現，大有疑問；而且也無法排除 Ngan lam 可能是直接譯自粟特胡之姓名的可能性；由是，吾人是否可以藉上述之推敲，認為依照藏文 Ngan lam 的發音，Ngan 很有可能是「安」的音譯，lam 則可能為其原有名字；或者就是其粟特名字的音譯，而 stag sgra klu khong 則是其入蕃後，所取用的吐蕃式名字。簡言之，就是在其原有姓名之後，再取吐蕃式名字。也因此英國理查遜（H. E. Richardson, 1905-2000）懷疑恩蘭氏（Ngan lam）可能出自中亞地區的氏族。⁷⁴

次就漢文史籍所載恩蘭達札路恭擁有一漢式名稱而言：《舊唐書·吐蕃傳》記載吐蕃於廣德元年（763）以吐谷渾、党項羌之眾二十餘萬，由李唐降將高暉引入李唐京師之後，提及立故邠王男廣武王承宏為帝的吐蕃大將「馬重英」之名。⁷⁵《資治通鑑》亦載：

吐蕃入長安，高暉與吐蕃大將馬重英等立故邠王守禮之孫承宏為帝，改元，置百官，以前翰林學士于可封等為相。⁷⁶

上述漢文獻所提及的馬重英，即為代宗永泰元年（765）乘僕固懷恩（691-765）叛唐之際，率領蕃軍侵唐的吐蕃四大將領之一的馬重英。⁷⁷比對蕃方文獻《敦煌古藏文卷子》B.M. Or.8212(187)〈吐蕃大事紀年〉虎年（762）所載：

學》，1989年第1期（1989年4月），頁103、107。

74 H. E. Richardson, "Ministers of the Tibetan Kingdom," *Tibet Journal*, Vol. 2, No. 1 (Mar., 1977), p. 20.

75 〔後晉〕劉昫：〈吐蕃傳上〉，《舊唐書》，卷196上，頁5237。

76 〔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223，「唐代宗廣德元年冬十月戊寅（初九）」條，頁7151-7152。

77 〔後晉〕劉昫：〈吐蕃傳上〉，頁5240。記載：「吐蕃大將尚結息贊磨、尚息東贊、尚野息及馬重英率二十萬眾至秦天界」，其中尚結息贊磨應為尚贊磨，尚息東贊即為尚東贊。

Zhang rgyal zigs // dang / Blon stag sgra dang Zhang stong rtsan dang
 Zhang / btsan ba las stsogs pas / Keng shir dra ma drangste Ke(Keng)
 shi phab // rGya rje bros // nas / rGya rje gsar du bcug /

尚結息 (Zhang rgyal zigs)、論達札 (Blon stag sgra, 即恩蘭達札路恭)、尚東贊 (Zhang stong rtsan)、尚贊磨 (Zhang btsan ba) 等引兵至京師，陷京師，李唐皇帝出逃，另立新的李唐皇帝。⁷⁸

上引文的四位將領之名，並未有漢史籍所錄之「馬重英」，其餘三位皆同。因此，李方桂院士（1902-1987）將蕃方文獻所載之恩蘭達札路恭，比定為漢籍所載之馬重英，李方桂院士更嘗試解釋為何恩蘭達札路恭另名為馬重英。其以為恩蘭達札路恭可能與夫蒙靈察一般，取姓馬。李方桂院士舉《舊唐書·李嗣業傳》所載，夫蒙靈察又為馬靈察，夫蒙為羌部落人之名，因此恩蘭達札路恭有可能屬羌部落人，而取馬姓。⁷⁹筆者以為李方桂院士上述的推論，似值得進一步商榷，因為恩蘭達札路恭另名馬重英，與夫蒙靈察又為馬靈察，二者同取「馬」姓似相彷彿，但夫蒙靈察與恩蘭達札路恭二人似乎不存有任何的相似性，因為第一，夫蒙靈察將原姓「夫蒙」改為「馬」，保留原有名字的形式，明顯與恩蘭達札路恭另名「馬重英」的形式完全不同，二者間似難「同理可證」；第二，恩蘭達札路恭另有漢式名字「馬重英」一事，有多種可能性，或有可能「馬重英」為其本名，則其可能來自於大食或中亞已信奉伊斯蘭教取名為 **Mahmet** 或 **Muhamud** 者，進入中原後，取其原名第一音，再取「重英」為名，而成馬重英，入蕃爾後再改用吐蕃姓氏名諱；或有可能其為早已進入中原之外族人士，為方便與中原人士往返而取用漢式名字，而早為中原人士所熟知，故於效力於蕃廷後，雖已改名換姓，但仍為中原人士所熟知，故仍稱其馬重英，而不名其蕃式姓名。朱悅梅教授（1969-）則另持一說，其據西北民族大學格

78 Ariane Spanien & Yoshiro Imaeda, *Fonds Pelliot Tibetain in Choix de Documents Tibétains conservés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1979), B.M. Or. 8212 (187), pl. 594. 第 53-54 行。

79 詳見 Fang Kuei Li 李方桂, "Notes on Stag Sgra Klu Khong," in Ernst Steinkellner & Helmut Tauscher (eds.), *Contributions on Tibetan Language, History and Culture* (Delhi: Motilal Banarasisidass Publishers, 1983), pp. 175-177.

薩爾研究院蘭卻加教授（1956-）告知，謂「馬重英」並非恩蘭達札路恭的漢文名字，而是 *rMa khrom*（瑪曲節度）的漢語音譯，朱教授據此以為恩蘭達札路恭正於西元七〇四年前後駐瑪曲節度統領吐蕃東道之軍。⁸⁰朱教授言下之意指恩蘭達札路恭因此為唐人載為「馬重英」。按此說早於一九八二年王堯（1928-2015）於《吐蕃金石錄》已言及「馬重英」的藏文對音為「*rMa grom*」。⁸¹但筆者以為有所疑義，其一：恩蘭達札路恭於敦煌文獻吐蕃大事紀年中，首次出現於西元七六二年，為攻佔長安的蕃軍將領之一，在此之前，敦煌文獻吐蕃大事紀年並未載及恩蘭達札路恭之名，而且七〇四年至七六二年，間隔了五十八年，似乎不太可能，而且朱教授未提任何依據，指恩蘭達札路恭於西元七〇四年前後駐於瑪曲節度；其二：按 *rMa khrom* 或 *rMa grom* 與馬重英之間的藏漢音轉，應以唐代時期唐蕃漢蕃語之間的音轉為準，不能以今音度之，因此 *Khrom* 的漢語音譯，可能是「乞隆姆」或「克隆姆」，而非今音的「沖姆」；若以「馬重英」以蕃語音譯則為「*ma jung ʔe*」，⁸²顯然，「英ʔe」韻母與 *m* 韻母並不吻合。更何況敵方邊防重地機關名稱，唐方將之誤載或誤解為人名，其無知如此，可能性極低矣。另有大陸學者任小波（1981-）重新解釋了「馬重英」的意思，提出了馬重英可能為藏文 *rMa grom* 的漢文音譯，而 *rMa grom* 有二解，一為吐蕃位於青海地區接界李唐的邊防機構之名稱；二為據埋藏本古籍《五部遺教》所載吐蕃中翼「十六境域」（*yul gru bcu drug*）之中，就有恩蘭及彭域二地，就位於拉薩北邊，是為恩蘭氏族的領地，該地設有 *rMa grom*（馬氏軍鎮）因而得名；而〈恩蘭達札路恭紀功碑〉原始位址就在此，即今拉薩北方的蔡公堂（*Tshal gung thang*）支村，任氏綜合上言以為：「馬重英」當即出自吐蕃本部又從黃河上游領兵東進並攻陷長安的 *rMa grom*（馬氏軍鎮）的譯音；恩蘭達札路恭在漢文史籍中被稱作「馬重英」，蓋因其曾擔任彭域千戶長，亦即為馬氏軍鎮統帥之職。⁸³按恩蘭達札路恭領軍攻入長安

80 朱悅梅：〈吐蕃東境（鄙）五道節度使研究〉，《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第24卷第1期（2014年3月），頁47。

81 詳見王堯（編著）：《吐蕃金石錄》（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頁90。

82 詳見周季文、謝後芳：《敦煌吐蕃漢藏對音字匯》（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156、201。

83 任小波：〈公元763年吐蕃陷長安之役——吐蕃王朝軍政體制探例〉，《歷史地理》，第33輯（2016年3月），頁108-117。

的時間為西元七六三年，事成後回蕃，方受贊普賜贈彭域，其氏族成員被永久賦與彭域千戶長之職，此於〈恩蘭達札路恭紀功碑〉之第四十一行至四十七行有載：

sku srungs vphan yul bavi stong dpon du gzhan su yang myi gzbug par
blon stag sgra klu khong gi myes po gsas slebs gyi bu tsha rgyud peld
las gang rngo thog pav / dmangs vdrang ba gcig / sku srung vphan yul
bavi stong dpon g-yung drung du stsald par gnanng ngo // ⁸⁴

禁衛軍彭域千戶長之職，永不授與他人，論達札路恭之先祖色腊的子孫後代之中，任何有一能力且能公正待民者，永遠授與禁衛軍彭域千戶長之職。⁸⁵

由上引碑銘所載即知，並非如任氏所云恩蘭達札路恭本身曾任彭域千戶長，這是任氏的誤解，此其一；其二，如任氏所云，所謂 rMa grom 有二處，其中一處位於吐蕃中翼之恩蘭氏族的領地，領地就稱為 rMa grom，任氏又將之視為「馬氏軍鎮」，此似乎值得商榷，因為按吐蕃的地方建制，蕃廷於吐蕃本部地區設立翼（Ru）及千戶（sTong sde），於軍事佔領區方設立 Khrom 或 Grom（軍鎮），此已為中外學界之定論矣！如是，於吐蕃本部的核心區中翼，焉有設立 rMa grom 馬氏軍鎮的可能？更何況 rMa 氏確屬吐蕃氏族之一，怎可能與另一姓氏 Ngan lam 有所交互使用或混淆呢？總之，因恩蘭達札路恭另有一漢式姓名，更增其為非吐蕃本土固有氏族的可能性。

參就其宗教信仰而言：羌部落的宗教屬於薩滿教，較接近於吐蕃原有的本波（Bon po），因此在取用漢姓之時，除非改宗伊斯蘭教，取用伊斯蘭式之名，否則衍用伊斯蘭式的「馬」姓之可能性極低；據藏文史籍如《大臣遺教》、《王統世系明鑒》、《新紅史》、《拔協》、《賢者喜

84 〈恩蘭達札路恭紀功碑〉正面碑銘第 41-47 行。詳見王堯（編著）：《吐蕃金石錄》，頁 66-67。

85 譯文參酌王堯（編著）：《吐蕃金石錄》，頁 83，並依原文文意對譯文作部份更動。

宴》諸書，均載達札路恭毀佛或信奉本波之事蹟，例如《王統世系明鑒》記載：

國王（墀松德贊）雖喜愛佛法，但是大臣瑪尚仲巴杰與達札路恭（Ta ra klu gong）等人勢大，其餘人不能對抗。⁸⁶

《新紅史》則載：

王子墀松德贊十三歲繼王位。大臣瑪祥仲巴杰及達熱祿恭（rta ra klu gong）等不喜佛法者權勢甚大〔……〕。⁸⁷

《賢者喜宴》記載：

當由漢人梅果（rgya me mgo）、天竺阿年達（rgya gar avanda）及精通漢語者加以翻譯。此三人在海波山（has po ri）的鳥穴內將佛典譯成藏語。這時，另外之大臣恩達刺路恭（blon po ngam ta ra klu gong）及舅臣（ma zhang）等等來到跟前，說道：「你們三個勤奮人在那裡做什麼？舅臣的小法有載：人死如果做冥福，定予隻身流放；不得奉行供養南方泥婆羅之神佛。這些你們沒聽到嗎？凡所行之諸多事務，如與佛法言論相同者，無需稟告於王，即當埋於沙中，然後以小法懲處。這是否還要辯論？」於是，對於此事，整事大臣會議（bkav yo gal vchos pavi mdun sa）接到緊急信息〔……〕。⁸⁸

上引三文之達札路恭（Ta ra klu gong）、達熱祿恭（rta ra klu gong）、恩達刺路恭（Ngam ta ra klu gong），指的就是恩蘭達札路恭（Ngan lam stag

86 薩迦·索南堅贊：《王統世系明鑒》，陳慶英、仁慶扎西（譯註）（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164。

87 班欽索南查巴：《新紅史》，黃顥（譯）（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25。

88 巴臥祖拉陳瓦著：《賢者喜宴——吐蕃史譯注》，黃顥、周潤年（譯註）（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125。筆者依《賢者喜宴》原文對譯文作了部份調整。原文見 dPav bo gtsug lag vphreng ba, *Chos vbyung mkhas pavi dgav ston* 《賢者喜宴》，葉78下，行3-6。

sgra klu khong），只不過後世史籍將 Ngan lam 合為 Ngam，stag sgra 簡化為 Ta ra 或 rta ra，khong 字則與 gong 字互通。上引三文顯指恩蘭達札路恭屬反佛大臣之陣營，與贊普在宗教上持對抗的態度。但究竟上述藏文史籍大部屬西元十二世紀以後問世之「教法史籍」，其內容或有荒誕不經，可信度較低，但某些情節的敘錄，似非空穴來風，有其傳承，誠如王忠所云教法史料究竟出自藏族史家之手，偶有所述，或為故老相傳，或為親見遺文遺物，⁸⁹不能忽略其重要性。筆者以為就其姓氏的藏文意義看來，極有可能是因其來自於中亞的異教徒，於奉佛的吐蕃贊普而言，其所信奉之宗教相對於佛教之正道，就是「歧途」或「導入歧途的惡道」，由於其為外來者入仕於蕃廷，立有大功，遂賜與蕃式姓氏，以代表具有異教意涵的 Ngan lam（歧途、惡道）賜之，表其所信之宗教異於佛教。就因為此姓，遂為後世藏族史家誤其為反佛者與贊普對抗，於是創作出許多事實上並不存在的情節，用以表現佛教與本教之間在唐代吐蕃歷史上的鬥爭與傾軋。

肆就其建議贊普攻取長安一事而言：恩蘭達札路恭曾參與了吐蕃於西元七六三年攻佔李唐長安的行動，此事件的來龍去脈，據約立於西元八世紀時期邏些布達拉宮前之〈恩蘭達札路恭紀功碑〉碑銘有所記載：

btsan pho Khri srong lde brtsan thugs sgam lav bkav gros gyis rgya che
bas / chab srid gar mdzad do cog duvang legs ste / rGyavi khams su
gtogs pavi yul dang mkhar mang po bcom ste bsdus nas // rGya rje
Hevu vgi wang te rje blon skrag ste / lo cig cing rtag du dpaya dar yug
lnga khri phul te / rGya dpyav vjal du bcug go //⁹⁰

墀松德贊贊普深沈果敢，議事有方，所行政事靡不佳妙，攻取許多唐屬領土城池。唐主孝感皇帝（rGya rje Hevu vgi wang te，肅宗廟號）君臣大怖，允諾繳納絹帛，每一年奉繳絹繒五萬匹。⁹¹

89 王忠：〈前言〉，收入氏著：《新唐書吐蕃傳箋證》（北京：科學出版社，1958年）。

90 〈恩蘭達札路恭紀功碑〉背面碑銘第41-49行。詳見王堯（編著）：《吐蕃金石錄》，頁76-77。

91 譯文參酌王堯（編著）：《吐蕃金石錄》，頁84，並依原文文意將譯文作部份更動。

依上引文，唐肅宗為吐蕃侵犯領土事，允諾每年繳奉吐蕃絹繒五萬匹，以求止息吐蕃之繼續入侵。但隨後事情有了變化，〈恩蘭達札路恭紀功碑〉碑銘續載：

devi vog du / rGya rje yab Hevu vgi wang de grongs ste / rGya rje sras
Wang peng wang rgyal por zhugs nas / Bod la dpyav vjal du ma rung
ste // btsan pho thugs snyung bavi tshe Ngan lam klu khong gis // rGya
yul gyi thild / rGya rjevi pho brang keng shir / Bod gyis dmag drang
bavi bkav gros gyi mgo chen po gsold nas keng shir drang bavi dmag
dpon chen phor //⁹²

其後，李唐皇帝之父孝感皇帝崩，其皇子廣平王登基，認為不適宜向吐蕃繳納絹帛，在贊普心中不悅之時，恩蘭路恭倡議興兵入唐，攻取李唐京師。⁹³

上引文指出唐肅宗駕崩，代宗（李豫，726-779）繼位後，不接受其父皇對吐蕃的承諾，而引起贊普的不滿，遂由恩蘭達札路恭提議贊普發兵直入京師。上述事件的內容及恩蘭達札路恭所扮演的角色，讓吾人憶起前文所述回紇登里可汗乘李唐國喪之際，率部眾入唐的情景。即如《舊唐書·迴紇傳》所載：「九姓胡素屬於迴紇者，又陳中國便利以誘其心，可汗乃舉國南下，將乘我喪。」⁹⁴亦即，恩蘭達札路恭如同其他粟特胡一般，顯然屬長期與李唐有所互動，瞭解中國內情並曉知李唐政局的粟特胡，因其有此方面的專長，為贊普所信任的「中國通」，所以能向贊普提建言，慫恿贊普墾松德贊乘隙侵漁中國。如此行徑，與依附回紇之粟特胡如出一轍。而且要求李唐每年貢奉絹帛的主意，亦可能出自於恩蘭達札路恭。由此觀之，恩蘭達札路恭屬於投靠吐蕃，效忠於蕃廷的粟特胡的可能性較高。

伍就恩蘭達札路恭因功受封賞的情形而言：按〈恩蘭達札路恭紀功

92 〈恩蘭達札路恭紀功碑〉背面碑銘第 49-56 行。詳見王堯（編著）：《吐蕃金石錄》，頁 77-78。

93 譯文參酌王堯（編著）：《吐蕃金石錄》，頁 84，並依原文文意對譯文作部份更動。

94 〔後晉〕劉昫：〈迴紇傳〉，《舊唐書》，卷 195，頁 5208。

碑〉碑銘記載：

blon stag sgra klu khong dang / zla gong gi bu tsha rgyud gang nye ba
gcig dngul gyi yi ge chen po g-yung drung du stsald par gngang ngo //
blon stag sgra klu khong gi pha zla gong gi bu tsha rgyud vpheld gyi
rnams zhang lon yi ge pavi thang dang / dmag sum rgyar gngang ngo //
sku srungs vphan yul bavi stong dpon du gzhan su yang myi gzhug par
blon stag sgra klu khong gi myes po gsas slebs gyi bu tsha rgyud peld
las gang rngo thog pav / dmangs vdrang ba gcig / sku srung vphan yul
bavi stong dpon g-yung drung du stsald par gngang ngo // ⁹⁵

論達札路恭與大公之子孫最近支脈之一，永久賜與大銀字告身。
論達札路恭之父大公之子子孫孫，均授予朝廷官員告身，並賜予
三百軍士。禁衛軍彭域千戶長之職，永不授與他人，論達札路恭
之先祖色腊的子孫後代之中，任何有一能力且能公正待民者，永
遠授與禁衛軍彭域千戶長之職。⁹⁶

歸納上引文所載蕃廷對恩蘭達札路恭家族的賞賜，包括授與大銀字告身、
賜予三百軍士、封授禁衛軍彭域千戶長之職等。上述三項中的後二項，引
起筆者的注意，原因在於吐蕃本土貴族均有屬於自身的部落，當其出仕蕃
廷之時，蕃廷按其官職授與告身，若立有大功者，則另授采邑與奴戶，並
保證不無罪剝奪任何土地財產等，⁹⁷少有提及像授與恩蘭達札路恭家族兵丁
與彭域（vphan yul）千戶長的永久職務。例如因擁立有功，贊普墀德松贊
（Khri lde srong btsan）賞賜僧相娘定埃增（Myang ting nge vdzin）諸項當
中，提及「sdevi dpon po rgyud du gngang ba（賜與其世襲部落長一職）」，
⁹⁸原因就在於娘氏為吐蕃本土貴族，自有部落，無需贊普賜與兵丁，相較於

95 〈恩蘭達札路恭紀功碑〉正面碑銘第 35-47 行。詳見王堯（編著）：《吐蕃金石錄》，頁 65-67。

96 譯文參酌王堯（編著）：《吐蕃金石錄》，頁 83，並依原文文意對譯文作部份更動。

97 詳見松贊干布與韋氏家族盟誓的誓詞。王堯、陳踐（譯注）：《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增訂本）》（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 年），頁 163-165。

98 〈諧拉康碑甲〉西面碑銘第 42 行。見王堯（編著）：《吐蕃金石錄》，頁 112。

由外地遷徙而來的粟特胡，就需要蕃廷的協助，包括賜與采邑土地，與保護其生命財產安全的軍士等。由此點看恩蘭氏族的來源，似乎與中亞粟特胡有關。

有關於此，另有一重要證據，即吐蕃官員於蕃廷立有大功者，獲得頒賜立碑，並撰刻銘文以記其事功之時，此碑均立於該有功官員所屬氏族之原領地，也就是其家鄉故里，以表彰其功勳，永傳後世。例如前文所提及之僧相娘定埃增，其所獲頒之石碑「諧拉康碑」，就坐落於拉薩河（sKyid chu）的上游區，即今拉薩東北墨竹工卡縣止貢區宗雪公社第五生產隊。⁹⁹此處應即是娘定埃增所屬娘氏（Myang）的領地，按《敦煌古藏文卷子》P.T. 1286〈小王家臣及贊普世系表〉所列，娘氏為壟若（Klum rovi ya sum）小王南巴布森帝（Nam pavi bu gseng ti）之家臣，¹⁰⁰其領地位於邏些城東北拉薩河的上游區，二者正是相同的地望，於此可見，大臣紀功石碑乃立於其所屬領地，並非立於吐蕃首府邏些；又如吐蕃工布藩國國王與吐蕃贊普盟誓，誓後所立石碑，就立於工布地區，即今林芝縣米瑞區廣久公社第五生產隊。¹⁰¹由上述二例可確證，吐蕃立碑之習，係將石碑立於當事人的領地。由此看來，恩蘭達札路恭紀功碑立於邏些布達拉宮之前，正意味其為外來者，當時並未享有采邑領地，故立之於布達拉宮之前。事後，贊普再封賜恩蘭氏族予彭域也區，按彭域（vphan yul）原為遭王室所滅岩波（Ngas povi khra sum）小王古止精波杰（dGug grivi zing po rje）之領地，現賜與恩蘭氏族，顯然恩蘭氏族確為外來氏族，應信而有徵。然而，西方學者哈梭德（Guntram Hazod, 1956-）於《古代西藏紀年：一本西藏最早歷史之譯註》一書中，論及有關〈恩蘭達札路恭紀功碑〉原始位址的問題，其以蔡公堂支村的一座大型古墓、古代恩蘭系地（Ngan lam sri）以及系長碑（Sri rdo ring）的故事為標題，進行簡要論述，包括指認距拉薩北方十二公里處的一座大古墳為恩蘭達札路恭之墓、原恩蘭達札路恭紀功碑原位址於蔡公堂支村，係於一六九三至九四年間由第五輩達賴喇嘛總管第悉

99 王堯（編著）：《吐蕃金石錄》，頁 115。

100 Ariane Spanien & Yoshiro Imaeda, *Fonds Pelliot Tibetain in Choix de Documents Tibétains conservés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PT. 1286, pl. 554. 第 14-15 行

101 王堯（編著）：《吐蕃金石錄》，頁 100。

桑結嘉錯所命，移至今布達拉宮之前，連同一塊無字碑叫內碑，雪碑就被稱之為外碑，原內外二碑都應該在蔡公堂支村，原因在於此處就是恩蘭氏族的采邑，另一采邑在彭域。¹⁰²另於該書頁二一六解釋吐蕃大事紀年中的一個詞彙：新恩蘭園（Ngan lam tsal gsar pa），此地原為贊旺（btsan vbang）氏族的領地，以此可證明恩蘭氏族是屬於贊旺六族（btsan vbang rus drug）群體中的一支。¹⁰³筆者以為哈梭德以上論點多所疑義：第一，彭域是原拉薩河河谷地區地方勢力古止森波杰（dGug grivi zing po rje）的領地，原非恩蘭氏族固有的領地；第二，彼等稱蔡公堂支村原是贊旺氏族的領地，但按贊旺藏文為 btsan vbang，意即贊普臣民，可能並非氏族之姓，因為筆者曾爬梳目前所能見及之吐蕃氏族姓氏，整理成「唐代吐蕃氏族一覽表」，計有一一四支，¹⁰⁴其中並無 btsan vbang；亦有可能是直屬於贊普王室的采邑，上述贊旺六族可能就是為王室照管經營王室采邑者的代稱，有關於此，實有待進一步的考索；第三，恩蘭氏的采邑均十分接近拉薩，是為贊普王室未崛起之前強勁對手森波杰的領地，恩蘭氏族實際上並未列名於森波杰陣營之中。

再者，藏族學者江瓊·索朗次仁（1954-）以為一四三四年問世的《漢藏史集》載及：「Phyivi rdo ring」（立於棄之長碑），指的就是〈恩蘭達札路恭紀功碑〉，是為立於「Phyi」（今音「棄」）的石碑，「Phyi」古音則為「庇」，與今日蔡公堂支（Kri）村之語音為 sPi（漢音譯為「畢」），二者發音相近；又今當地耆老亦言，相傳該村有石碑「飛」至布達拉宮前的傳說，依此，索朗次仁以為西元一六九四年由第五輩達賴的總管桑結嘉措（Sang rgya rgya mtsho, 1653-1705）所命，將〈恩蘭達札路恭紀功碑〉由蔡公堂支村移至布達拉宮之前；¹⁰⁵索朗次仁續考恩蘭氏族的發祥地，認為依《第吳宗教源流》所載，恩蘭氏族為吐蕃中翼十六將

102 Brandon Dotson, *The Old Tibetan Annals: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ibet's First History* (Wien: Verlag der o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2009), pp. 181-182.

103 Brandon Dotson, *The Old Tibetan Annals: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ibet's First History*, p. 216.

104 林冠群：《唐代吐蕃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1年），頁 571-572，表 13，「唐代吐蕃氏族一覽表」。

105 江瓊·索朗次仁：〈雪碑最初立碑位置考〉，《西藏研究》，2015年第3期（2015年6月），頁 38-39。

(tshan) 之一，由此研判恩蘭的領地位於中翼境內，境內又有山名為恩蘭仲巴山 (Ngan lam gron pa ri)，境內又有一座大古墳，似應為恩蘭達札路恭之墓，據上研判恩蘭氏族之起源地就在蔡公堂支村。¹⁰⁶就以上江瓊·索朗次仁的論點，姑不論以語音來識別古今之地名，或以地方的傳說，作為根據來指認某事，是否為可靠踏實的方法；首先就應辨明究竟《五部遺教》所載的吐蕃中翼「十六境域」(yul gru bcu drug) 之中，就有恩蘭及彭域二地的說法，與《第吳宗教源流》所載之恩蘭氏族為吐蕃中翼十六將 (tshan) 之一的說法，究竟是同一？還是不同？因為恩蘭是氏族姓氏、彭域是地名，而且二書所載的吐蕃地方建制是屬何時期？此攸關後續的論證；再者，恩蘭氏族所獲包括彭域或蔡公堂支村的領地，乃恩蘭達札路恭立功後，方由墀松德贊贊普封賜，如是，更能證實恩蘭氏族並非吐蕃本土的氏族。

就以上五處疑點看來，於唐蕃關係中，吐蕃攻佔李唐京師十三天期間，成立傀儡政府的大戲，竟可能是由一位疑似出身於粟特胡者所主導。

伍、 結論

綜合以上所述，生活於中亞的粟特胡，因中亞適位於東西交通的必經之地，粟特胡發展出其特有的經商能力。於中古時期，足跡遍及了北亞、東亞、南亞、西亞以及歐陸。由於其自西元四世紀甫初，即有紀錄顯示其已展開經商，直至西元十世紀止，長達六百餘年，因而形成世代傳承的經商傳統。粟特胡經商的特色，就在介於不同生產手段的地域之間，不同的政權之間從事中介的角色，互通有無。復因長時間與廣大空間下，以家族式的形態經商，代代相傳，因而具備了豐富的國際知識，對中古時期各地域政權內部的政情、人文風貌等無不熟稔，掌握各國的語言，而成為北亞游牧政權與東亞農業朝廷之間的溝通者，或東亞農業朝廷與南亞農牧兼營政權之間關係變化的推動者，甚至還介入各政權之中，成為各統治階層的獻策者。

106 江瓊·索朗次仁：〈雪碑最初立碑位置考〉，頁 40-41。

吾人由中亞粟特胡上述的表現，學界早有如下的認知，例如榮新江以為發動安史叛亂的首領安祿山、史思明，及其核心的將領大部屬粟特胡人，此所導致的後遺症，包括安史亂後李唐內部頻生攻擊胡人與排斥胡化的現象、中唐時代思想界對於胡化的反彈等，演成韓愈（768-824）等人發動的復古運動，其影響所致最終造成宋朝的內斂與懦弱。¹⁰⁷

由此觀之，中亞粟特胡之所以能於中古時期於歐亞內陸及其周邊諸國，扮演著關鍵性角色，發揮出重大影響力，主要還是因為粟特胡長期壟斷東西貿易事業所致。換句話說，沒有絲綢之路與東西貿易的早先存在，就沒有居住於中亞粟特胡後來的壟斷，也就沒有粟特胡在中古時期所扮演的角色與影響力。東亞、中亞、北亞、南亞各區域於中古時期，不論其內部的演進，或上述各區域之間關係變化的推動，或云中古時期亞洲歷史演進的動力等等，竟部份繫於粟特胡身上。於此，日本脫絲路史觀論者與韓森教授（Valerie Hansen, 1958-）之質疑「絲路交通」或「絲路貿易」等，¹⁰⁸似可休矣！♦

107 榮新江：《中古中國與粟特文明》，頁 291。

108 韓森教授所撰《新絲路史》（*The Silk Road: A New History*）一書，書中主旨表達對所謂「絲路交通」或「絲路貿易」的重新認識。該書認為：「如果說任一時間點的運載量、交通量或旅人數量，是評估一條路線重要性的唯一判準，那麼絲路可說是人類史上旅行量最低，或者說是最不值得研究的一條路線。」其又云：「本書引用許多文書顯示絲路貿易經常是地方性的，而且規模很小。即便最熱切相信貿易量大且頻繁的人，也必須承認被大肆吹噓的絲路貿易並沒有太可靠的實證基礎。〔……〕出土證據在本書中佔最重要的位置，因為它是真實的、一手的：與實際的繳稅清單或商人的通行證相比，關於貿易的各種綜述顯得蒼白無力。的確，可用的證據少之又少，而且關鍵部分時常佚失，不過它們來自各個不同的發現地，為一個地方性的、小規模的貿易圖像提供可信依據。」準上所引，韓森教授質疑「絲路交通」或「絲路貿易」之主張，至為明顯。詳見氏著：《絲路新史：一個已經逝去但曾經兼容並蓄的世界》，吳國聖、李志鴻、黃庭碩（譯）（臺北：麥田出版，2015年），頁 301、304-305。

♦ 責任編輯：郭雨穎



【圖一】間野英二所舉阿胡拉西雅布及彭吉肯特出土之建築物壁畫¹⁰⁹

109 資料來源：https://wikivisually.com/wiki/Afrasiab_painting，檢索日期：2019年9月3日。

引用書目

古代文獻

- 〔西漢〕司馬遷 SIMA, Qian
1976 《史記》（臺北：鼎文書局，1976年）。
Shi Ji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Taipei: Tingwen Book Company, 1976).
- 〔唐〕溫大雅 WEN, Daya
1985 《大唐創業起居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Da Tang Chuangye Qijuzhu [Court Diaries of the Founding of the Great Tang]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5).
- 〔唐〕魏徵等撰 WEI, Zheng et al.
1980 《周書》（臺北：鼎文書局，1981年）。
Sui Shu [Book of Sui] (Taipei: Tingwen Book Company, 1980).
- 〔唐〕令狐德棻等撰 LINGHU, Defen et al.
1981 《周書》（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Zhou Shu [Book of Zhou]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1).
- 〔唐〕慧立、彥棕 SHIH, Huili & SHIH, Yentsung
1983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收入《大藏經》，史傳部二（臺北：新文豐出版，1983年）。
Da Tang Daciensi Sanzang Fashi Zhuan, in Chinese Buddhist Canon, History and Biographies Section, Vol. 2 (Taipei: Xinwenfeng Press, 1983).
- 〔唐〕陳子昂 CHEN, Ziang
1975 《陳伯玉文集》，《四部叢刊初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年）。
Chen Boyu Wenji, in Sibu Congkan Chubian, Vol. 613-615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75).
- 〔唐〕杜佑 DU, You
1963 《通典》（臺北：新興書局，1963年）。
Tongdian [Comprehensive Institutions] (Taipei: Xinxing Book Company, 1963).
- 〔後晉〕劉昫 LIU, Xu
1976 《舊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76年）。
Jiu Tang Shu [Old Book of Tang] (Taipei: Tingwen Book Company, 1976).

- 〔北宋〕司馬光 SIMA, Guang
1980 《資治通鑑》（臺北：逸舜出版社，1980年）。
Zizhi Tongjian [Comprehensive Mirror in Aid of Governance]
(Taipei: Yishun Publishing, 1980).
- 〔北宋〕歐陽修、宋祁 OUYANG, Xiu & SONG, Qi
1976 《新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76年）。
Shin Tang Shu [New Book of Tang] (Taipei: Tingwen Book
Company, 1976).
- SPANIEN, Ariane & IMAEDA, Yoshiro
1978 *Fonds Pelliot Tibetain in Choix de Documents Tibétains conservés a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Paris*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1978).
- dPAV bo gtsug lag vphreng ba 巴臥祖拉陳哇
1962 *Chos vbyung mkhas pavi dgav ston* 《賢者喜宴》(New Delhi: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Indian Culture, 1962).

近人文獻

- 王忠 WANG, Zhong
1958 《新唐書吐蕃傳箋證》（北京：科學出版社，1958年）。
Xin Tang Shu Tubochuan Jianzheng (Beijing: Science Press, 1958).
- 王堯（編著） WANG, Yao (ed. & au.)
1982 《吐蕃金石錄》（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
Tubo Jinshilu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ublishing House, 1982).
- 王堯、陳踐 WANG, Yao & CHEN, Jian
1982 〈吐蕃職官考信錄〉，《中國藏學》，1989年第1期（1989年
4月），頁102-117。
“Tubo Zhiguan Kaoxinlu,” *Zhongguo Zangxue [China Tibetology]*,
No.1 (Apr., 1989), pp. 102-117.
- 王堯、陳踐（譯註） WANG, Yao & CHEN, Jian (trans. & an.)
1992 《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增訂本）》（北京：民族出版社，
1992年）。
Dunhuangben Tubo Lishi Wenshu, Enlarged Edition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of Minority Nationalities, 1992).
- 王明珂 WANG, Ming-ke
2009 《游牧者的抉擇：面對漢帝國的北亞游牧部族》（臺北：聯經
出版事業公司，2009年）。
Youmuzhe de Jueze: Miandui Han Diguó de Beiya Youmu Buzu
(Taipei: Linking Publishing Co., Ltd., 2009).

巴臥祖拉陳瓦 dPAV bo gtsug lag vphreng ba

2010 《賢者喜宴——吐蕃史譯注》，黃顥、周潤年（譯註）（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0年）。

Xianzhe Xiyan: Tuboshi Yizhu, Hao Huang & Runnian Chou (trans. & an.) (Beijing: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2010).

朱悅梅 ZHU, Yuemei

2014 〈吐蕃東境（鄙）五道節度使研究〉，《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第24卷第1期（2014年3月），41-54。

“Tubo Dongjing (Bi) Wudao Jiedushi Yanjiu [A Study on the “so blon sde lnga” in the Tubo(吐蕃) Period],” *Zhongguo Bianjiang Shi di Yanjiu* [*China's Borderland History and Geography Studies*], Vol. 24, No. 1 (Mar., 2014), pp. 41-54.

林恩顯 LIN, En-shean

1988 《突厥研究》（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年）。

Tujue Yanjiu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8).

林冠群 LIN, Kuan-chun

2011 《唐代吐蕃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1年）。

Tangdai Tuboshi Yanjiu (Taipei: Linking Publishing Co., Ltd., 2011).

2016 《玉帛干戈——唐蕃關係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6年）。

Yubo Gange: Tang-Fan Guanxishi Yanjiu (Taipei: Linking Publishing Co., Ltd., 2016).

芮樂偉·韓森 HANSEN, Valerie

2015 《絲路新史：一個已經逝去但曾經兼容並蓄的世界》，吳國聖、李志鴻、黃庭碩（譯）（臺北：麥田出版，2015年）。

Silu Xinshi: Yige Yijing Shiqu dan Cengjing Jianrongbingxu de Shijie [*The Silk Road: A New History*], Guo-sheng Wu, Zhi-hong Lee, Ting-shuo Huang (trans.) (Taipei: Rye Field Publishing Co., 2015).

周季文、謝後芳 CHOU, Jiwen & HSIEH, Houfang

2006 《敦煌吐蕃漢藏對音字匯》（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6年）。

Dunhuang Tubo Han-Zang Duiyin Zihui (Beijing: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2006).

柳立言 LAU, Nap-yin

2008 《宋代的家庭和法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Songdai de Jiating he Falu (Shanghai: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2008).

- 班欽·索南查巴 Pan-chen bSod-nams grags-pa
 1984 《新紅史》，黃顥（譯）（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
Xin Hong Shi [Deb ter dmar po gsar ma], Hao Huang (trans.)
 (Lhasa: Tibet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4).
- 張怡蓀（主編） CHANG, Yi-sun (ed.)
 1993 《藏漢大辭典》（北京：民族出版社，1993年）。
Zanghan Dacidian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of Minority Nationalities, 1993).
- 張廣達 CHANG, Guang-da
 1995 《西域史地叢稿初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Xiyu Shidi Conggao Chubian (Shanghai: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1995).
- 間野英二 MANO, Eiji
 1978 〈中央アジア史とシルクロード——シルクロード史観との訣別——〉，《朝日アジアレビュー》，第9卷第1號（1978年3月），頁30-36。
 “Chūōajishi to Shirukurōdo: Shirukurōdo Shikan tonō Ketsubetsu,”
Asahi Aja Rebyū, Vol. 9, No. 1 (Mar., 1978), pp. 30-36.
 2008 〈「シルクロード史観」再考——森安孝夫氏の批判に関連して〉，《史林》，第91卷第2號（2008年3月），頁402-422。
 “‘Shirukurōdo Shikan’ Saikō: Takao Moriyasu shi no Hihan ni Kanren shite [A Reconsideration of Central Asian History Centered on the Silk-Road Theory, In Light of Takao Moriyasu's Criticism],”
Shirin, Vol. 91, No. 2 (Mar., 2008), pp. 402-422.
- 森安孝夫 MORITASU, Takao
 2016 《シルクロードと唐帝国》（東京：講談社，2016年）。
Shirukurōdo to Tōteikoku (Tokyo: Kodansha, 2016).
- 程越 CHENG, Yue
 1994 〈粟特人在突厥與中原交往中的作用〉，《新疆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會科學版）》，第22卷第1期（1994年2月），頁62-67。
 “Suteren zai Tujue yu Zhongyuan Jiaowang zhong de Zuoyong,”
Journal of Xinjia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Vol. 22, No. 1 (Feb., 1994), pp. 62-67.
- 楊銘 YANG, Ming
 2008 〈唐代吐蕃與粟特關係考述〉，《西藏研究》，2008年第2期（2008年4月），頁5-14。
 “Tangdai Tubo yu Sute Guanxi Kaoshu [Relationships between

Tubo and Sute in Tang Dynasty],” *Tibetan Studies*, No. 2 (Apr., 2008), pp. 5-14.

楊質夫 YANG, Zhifu

1976 《藏漢小辭典》(臺北：蒙藏委員會，1976年)。

Zhang-Han Xiaocidian (Taipei: Mongolian and Tibetan Affairs Commission, 1976).

榮新江 RONG, Xinjiang

2009 〈絲綢之路上的粟特商人與粟特文化〉，收入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編)：《西域：中外文明交流的中轉站》(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75-90。

“Sichouzhilu shang de Sute Shangren yu Sute Wenhua,” in Chinese Civilisation Centr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eds.), *Xiyu: Zhongwai Wenming Jiaoliu de Zhongzhuanzhan* (Hongko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2009), pp. 75-90.

2014a 《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北京：三聯書店，2014年)。

Zhonggu Zhongguo yu Wailai Wenming (Beijing: Joint Publishing, 2014).

2014b 《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修訂版)》(北京：三聯書店，2014年)。

Zhonggu Zhongguo yu Wailai Wenming, Revised Edition (Beijing: Joint Publishing, 2014).

薩迦·索南堅贊 bSod Nams rGyal mTshan

1985 《王統世系明鑒》，陳慶英、仁慶扎西(譯註)(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5年)。

Wangtong Shixi Mingjian [Rgyal rabs gsal ba'i me long], Qangying Chen & Renqingzhaxi (trans. & an.) (Shenyang: Liaon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5).

護雅夫 MORI, Masao

1967 《古代トルコ民族史研究 I》(東京：山川出版社，1967年)。
Kodai Toruko Minzokushi Kenkyū I (Tokyo: Yamakawa Shuppansha Ltd., 1967).

1987 〈絲路和粟特人〉，收入岡崎敬等著：《絲路與佛教文化》，張桐生(譯)(臺北：業強出版社，1987年)，頁178-208。

“Silu he Suteran [Shirukurōdo to Sogudojin],” in Gangqi Jing [Okazaki, Takashi] et al., *Silu yu Fojiao Wenhua* [Shirukurōdo to Bukkyō Bunka], Tong-sheng Chang (trans.) (Taipei: Ye Qiang Publishing, 1987), pp. 178-208.

DOTSON, Brandon

2009 *The Old Tibetan Annals: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ibet's First History* (Wien: Verlag der o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2009).

LI, Fang Kuei 李方桂

1983 “Notes on Stag Sgra Klu Khong,” in Ernst Steinkellner & Helmut Tauscher (eds.), *Contributions on Tibetan Language, History and Culture* (Delhi: Motilal Banarasisidass Publishers, 1983), pp. 175-181.

RICHARDSON, H. E.

1977 “Ministers of the Tibetan Kingdom,” *Tibet Journal*, Vol. 2, No. 1 (Mar., 1977), pp. 10-27.

SIMS-Williams, N.

1989 “The Sogdian Inscriptions of the Upper Indus: A Preliminary Report,” in Karl Jettmar (ed.), *Antiquities of Northern Pakistan: Reports and Studies*, Vol. 1 (Mainz: P. von Zabern, 1989), pp. 131-137.

TUCCI, G.

1949 *Tibetan Painted Scrolls*, Vol. 3 (Suffolk, GB: Antique Collectors Club Ltd., 1949).

URAY, G.

1983 “Tibet’s connections with Nestorianism and Manicheism in the 8th-10th Centuries,” in Ernst Steinkellner & Helmut Tauscher (eds.), *Contributions on Tibetan Language, History and Culture* (Delhi: Motilal Banarasisidass Publishers, 1983), pp. 399-429.